

丹枝文史

第二辑



中国人民
政治协商会议

丹棱县委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
一九八七年六月



目 录

见面的话	(2)
李焘和他的历史巨著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	邓 盾 (3)
龙鹄探胜	傅剑勋 (9)
巽岩书院浅解	吴家瑞 (16)
李、蓝起义军丹棱突围始末	邓代耘 (18)
漫话“丹棱八景”	邓 铖 (23)
封面题签：谢 名 显	
封面设计：王 保 林	

目 录

见面的话	(2)
李焘和他的历史巨著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	邓 盾 (3)
龙鹄探胜	傅剑勋 (9)
巽岩书院浅解	吴家瑞 (16)
李、蓝起义军丹棱突围始末	邓代耘 (18)
漫话“丹棱八景”	邓 钺 (23)
封面题签：谢 名 显	
封面设计：王 保 林	

见 面 的 话

《丹棱文史》和大家见面了。

我们丹棱这块地方，设县以治，大概是始于南齐，时名为“齐乐”，北周改称“洪雅”，隋开皇十三年（593）与今洪雅县分治，因县之北有赤崖山，故更名为“丹棱”，“盖取赤崖丹川之义也”，（引自〔乾隆〕《丹棱县志》）迄今已近一千五百年了。此间，人文蔚起，名流辈出，可朋、唐庚、李焘、李壁、孙道夫、彭端淑、彭肇洙、彭遵泗、李昶元诸公，以及广大淳朴的丹棱人民，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，向大自然，向不合理的旧制度，开展了漫长而艰苦卓绝的斗争。谱写了粲然的历史篇章，且是丹棱人民引以自豪的篇章。

“观今宜鉴古”。当前，全国人民正热火朝天地开展“四化”建设。为了使我们的建设事业更加切合实际，非以历史作为借鉴断然不可；同时亦可以地方的历史，教育我们的后代热爱故土，热爱祖国，从而焕发工作热情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，这就是我们创办《丹棱文史》的最根本目的。

《丹棱文史》适合广大老、中、青文史爱好者阅读。它融资料性、科学性、广泛性、趣味性为一体。仅借初次和大家见面的机会，祝大家万事如意，并殷切期望各方面人士积极投稿，和我们携起手来，共同把它办好，使之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。引自（《大学》）

《丹棱文史》编辑小组

1987年 元旦

李焘和他的历史巨著——

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

邓 盾

李焘是我国南宋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。南宋初年，在秦桧大兴文字狱，查禁野史的险恶环境中，他顶着诬陷和诽谤，敢于坚持实事求是，不以私意淆乱是非的精神治史，以毕生精力致于北宋历史的研究，纂集成记载北宋时期“一祖八宗”之事的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。明代的《永乐大典》，清代的《四库全书》皆收入此书；近年来中华书局已将这部长达一千余卷的巨著点校出版发行。

(一)

李焘，字仁甫，一字子贞，号巽岩，谥文简，丹棱县龙鹤山人，生于北宋徽宗政和五年(1115)，卒于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(1184)，享年七十岁。

李焘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十八世孙。垂拱四年(688)唐宗室琅琊王李冲因反对武则天起兵事败，武则天因之大杀唐宗室，“壮者皆被诛死，幼者皆没入为官奴，或匿民间为庸保。”(见方壮猷《南宋编年史家二李年谱》)时李焘的十六世祖李偁任左武卫大将军，为了免遭其害，遂弃职逃奔入蜀，隐居于丹棱县北龙鹤山民间。之后，至焘凡十七代均世居于此。李焘的曾祖李夔，祖父李凤均有学职，父李中是

大观三年(1109)进士，知仙井监(今仁寿)，他学识渊博，善通经史。李焘出身于这样一个书香门第，加之他天资聪颖，刻苦致学，绍兴八年(1138)即中进士。

李焘的少年和青年时期，正是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国家遭受内忧外患的多难之秋，他目睹国家狼烟四起，人民颠沛流离的悲惨景象而忧心忡忡。绍兴五年(1135)他追念靖康之耻“愤金仇未报，著《反正议》十四篇，皆救时大务。”（见《宋史·李焘传》）

李焘在中了进士以后，朝廷即任命他为华阳县主簿，可是他并没有急急忙忙地去做官，而是感到自己的学识尚不巩固，故又回到家乡龙鹄山，一面讲学，一而攻读深造。他深切地认识到人之求学与处事应取正直而有分析的态度；他在《巽岩记》中写道：“可与共学，未可与适道；可与适道，未可与立；可与立，未可与权。夫人各有所履，善恶分焉。惟能谦可与共学，惟能复可与适道。”（见〔宋〕岳珂《桯史》）到了绍兴十年（1140）他才去华阳就任，先后在地方任县令、推官、知州、知府、转运判官等职。乾道三年（1167）召对入京，先后任兵部员外郎、礼部侍郎、国史馆编修、敷文阁学士等官职。在此期间，他刚正不阿，禀公执法，体察民间疾苦，敢于碰硬严惩贪官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敢于向皇帝直谏。乾道三年（1167）八月孝宗召对时，他“首举衣赈治身、治家、治官、治吏典故，以为恢复之法，乞增置谏官，许六察言事；请练兵，毋增兵；杜诸将私献，核军中虚籍”。（见《宋史·李焘传》）他的这些意见皆切中时弊，为孝宗所嘉纳。有一次他还直切了当地批评孝宗服药过多，不理朝政，嫔妃无时进见，浮费太多。孝宗在听了李焘的逆耳忠言后感慨地说：“感卿忠爱，然朕

春秋已高，安得此声！”（见周必大《李焘神道碑》）及至李焘临终弥留之际，仍然不忘国家中兴大业，他说：“所恨报国缺然”，望孝宗“经远以艺祖为师，用人以昭陵为则”。（见《宋史·李焘传》）

（二）

李焘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，平生著述近三千卷，其中历史著作竟达二千六百多卷。《宋史·李焘传》称他：“独博极载籍，搜罗百氏，慨然以史自任，本朝典故，尤悉力研核。”他的卷帙浩繁的历史著述中，当首推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。

我国编年体史书虽然滥觞于春秋，然其极盛当在宋。司马光所著《资治通鉴》可谓集编年史之大成，“继温公（司马光）而起者，则以李巽岩之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与李秀岩之《高宗系年要录》为代表焉”。（见方壮猷《南宋编年史家二李谱》）李焘在青年时就十分酷爱史学，并萌发了编撰一部记载北宋历史的著述，从而使南宋朝廷能够从北宋一百余年的兴衰成败，直至覆亡的历史中得到借鉴，因此在他去华阳上任以后，使利用公余之暇，广为搜集皇朝实录、正史，稗官野史，以及官府文书，典章制度等资料。绍兴十七年（1147）李焘的父亲李中逝世，李焘便利用回家守孝的三年时间，闭门著书，先后写成了《历代宰相年表》、《天禧以来御史年表》、《天禧以来谏官年表》、《续皇朝百官公卿表》等著述，为编撰《长编》做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工作。从此，在四十年漫长的岁月里，无论环境怎样险恶，官职几经调动，他都以惊人的毅力从未间断过《长编》的编撰。

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以编年体记载了北宋九朝计一百六十八年的历史事实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称：“焘博极群书，尤究心掌故。以当时士大夫各信所传，不考诸实录正史，家自为说。因踵司马光《通鉴》之例，备采一祖八宗事迹，荟萃讨论作为此书”。是为“读史者考证之林也”。清人谭锺麟在《重刊〈续资治通鉴长编〉序》中称该书“使北宋一代事实粲然明备，实为《通鉴》后不可不读之书，……欲考北宋遗事，舍此书曷以哉”。这部著述达九百八十卷之巨，加上《修换事目》十卷，《建隆至靖康举要》六十八卷，《总目》五卷，共计一千零六十三卷。南宋学者叶适说：“《春秋》之后才有此书”。汪应辰亦称该书“凡经传、历代史书，以及本朝典故，皆究其本末，参考异同，归于至当”。当这部巨著送这宋孝宗赵昚时，“诏藏秘阁”，并称赞李焘“无愧于司马迁”。（见《宋史·李焘传》）

（三）

从李焘编撰《长编》的事迹中，可以看到他那十分高洁的史德和史家法度。

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史精神，不篡改历史，不以私意淆乱是非。北宋初年修的《太祖实录》，由于皇帝的干预，史官的违迎，因而与史实出入很大，之后又经王禹偁再修，因王直书史实而被出知黄州，后再著《建隆遗事》。李焘为了订正史实，著《建隆遗事辨》。南宋初年由于王安石与司马光两党政见各异，《神宗实录》前后几经修纂，仍然各持己见，且互为攻讦。李焘曾经严肃地指出，《神宗实录》和《哲

宗实录》“不独于事实有所漏略而已，又辄以私意变乱是非”。（见《宋会要辑稿》）乾道六年（1170）李焘奏请宋孝宗“刊正《徽宗实录》之疏舛者”。（见方壮猷《南宋编年史家二李年谱》）此外，我们还可以从李焘几次向宋孝宗进《长编》的《进书状》看到他实事求是的治史精神。他写道：“臣尝尽力史学，于本朝故事尤切欣慕，每恨学士大夫各信所传，不考诸实录、正史，纷错难信。如建隆开宝之禅授，涪陵岐魏之迁没，景德庆历之盟誓，曩霄谅祚之叛服，嘉祐之立子，治平之复辟，熙宁之更新，元祐之图旧，此事最大，家自为说。臣辄发愤讨论，使众说咸会于一”。（兴隆元年《进书状》载〔宋〕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）“旁采异闻，补实录正史之阙略；参求真事，破巧说伪辨之纷纭。”（乾道四年《进书状》载同上）“……然熙、丰、祐、圣、靖、崇、观、和、康之大废置、大征伐，关天下之大利害者，其事迹比治平以前特异。宁失之繁，无失之略。必须睿明称制临决，如两汉宣章故事，无使各自为说，乃可传信无穷。”（淳熙元年《进书状》载同上）李焘和司马光的政治见解虽然十分接近，然而他在治史中并没有对司马光的见解全部加以肯定，而是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，决不以私意定取舍。

其次，李焘在撰写《长编》中，如果没有惊人胆量和气魄也是万万不行的。在我国历史上，本朝人写本朝的历史是罕见的。何况李焘在撰写《长编》的初年，正值奸相秦桧大兴文字狱，罢史馆，查禁私史，如果稍有不慎即会招来杀身之祸。其后，李焘在知泸州时，提刑何熙志在孝宗面前告他的黑状，说“《长编》记魏王食肥彘，语涉诬谤。”（见《宋史·李焘传》）而对这样的险恶环境，李焘并没有中

断《长编》的编撰。清代学者孙原湘在评价李焘对史学的贡献时说：“浅识既不能言，拘儒又不敢言，而文简以宋臣言宋事，独能继南、董之笔，援《春秋》之义，发愤讨论，使众说咸归于一，厥功不在司马氏下矣”。

此外，李焘还以十分谨慎和谦逊的态度对待史学研究。他非常重视资料工作，宋代学者周密在《癸辛杂识》中记载了李焘在编撰《长编》中的资料工作，他说：“焘为《长编》以木厨十枚，每厨抽替匣二十枚，每替以甲子志之。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。此匣分日月先后次第之，井然有序，云云。则其用功之专且久可概见矣。”李焘在《长编》一书的命名问题上表现了他十分谦逊的态度。他在乾道四年四月《进〈续资治通鉴长编〉表》中写道：“……统会众说，拊击伪辨，使奸欺讹讹不能乘隙乱真。祖宗之丰功盛德益以昭明，譬诸海狱或取涓埃之助。顾臣此书诂可便谓《续资治通鉴》，姑谓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庶几可也。”谭钟麟称该书“曰《续长编》不曰《续通鉴》，谦也”。（《重刊〈长编〉序》）

（四）

李焘在治史中敢于坚持实事求是，敢于碰硬，忠于史实的崇高史德，的确是难能可贵的。《宋史》对李焘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：“焘性大刚，特立独行。早著书，桢尚当路，桢死始闻于朝。暨在从列，每正色以订国论。张栻尝曰：‘李仁甫如霜松雪柏，无嗜好，无姬侍，不殖产，平生生死文字间，《长编》一书用力四十年，叶适以为《春秋》后才有此书。’”

龙 鹄 探 胜

傅 剑 勋

丹棱城北，群山起伏，连绵不断，犹如沧海碧波，奔腾不息。其中有一座风光奇绝的龙鹄山，它在唐代为龙鹤山，厥后宋孝宗手书“龙鹄山”三字赐李焘（宋大史学家，文学家，丹棱人）后才更名龙鹄山。原是道教地圣，有三宫九观之称：上曰天庆，下曰龙鹄，中为崇贞，建于唐贞观年间，清朝末年，上观毁于火，下观圯坏，惟中观清幽完整，至解放初期始被拆除。龙鹄山不仅山青水秀，景色宜人，更主要是李焘的故里，文物荟萃的地方——包括石窟寺，石刻，古墓葬，古遗迹等文物。因此，历代不少文人士徜徉于山水、名胜古迹间，赏景吊古，吟咏题诗留念。

附：清邑令河南亚元王承志《龙鹄山》诗

游山逸兴几人同 此日登临趁晓风
蜡屐南来纡径滑 杖藜西去小桥通
青余石隙斑留竹 赤到霜林醉染枫
指点白云深处是 乱溪环绕一峰中

蹊尽巉梯到岭头 南安风景望中收
三官迹可登龙想 九观各难刻鹄求
有酒但浇丞相墓 无琴谁赋大江流
我来欲向山灵约 留得新游话旧游

鞭梢笠影曙光寒 乞与山灵咏考盘
雁字名湖传信早 龙涎作洞觅香难
泉回谷口波纹细 人到峰头眼界宽
南波君臣唯有孝 残碑留得古今观

巽崖书屋是宋李焘父子读书处，据《明统志》记：“宋李焘少时读书于此，筑室曰巽崖，子壁、真亦读书于此。”巽崖位于龙鹄山之右，其自记云：“子真子三卜居乃得此山，向东南，面西北，其位为巽为乾，盖处已非乾则无以立，应物非巽则无以行。……然非巽则权亦不可行，学至子巽，乃可与权，此圣贤事业也。”因以名之。“巽崖书屋”四字遗迹犹存。蜀之三大书院——锦江、朝阳、巽崖——之一的巽崖书院就在龙鹄山下。诗人瞿敬笏主讲巽崖书院二十三载，著有《白雪堂诗稿》传世。

附：宋·魏了翁咏《巽崖书屋》

凤凰池上春风梦 龙鹄山头夜月秋

宋·李壁诗

萧条白日闭崖扃 留得游人万古情

犹有山中旧麋鹿 举头如听读书声

清·彭端淑咏《巽崖书院》

文简善著书 筑宽巽山下 精心四十年

遗编等班马 赤壁垂琳琅 谁为后来者

三相祠：旧名李相祠，又名仁甫祠。在龙鹄观后，祀李文简公父子（李焘：礼部侍郎，敷文阁学士，赐太师温国公，谥文简；李壁，礼部尚书，端明殿学士，赐资政殿学士，谥文懿；李真，礼部侍

郎，资政殿学士，赐端明殿学士，谥文肃。因此，人称“三相”）。清咸丰时县令张熙照建，民国十一年知事杨万成见其规模湫隘，捐俸金修葺，后川军总司令兼省长刘成勋又拨款补助将祠宇营建完善，增修船房三楹，后殿三间，祀李文简先代，祠外建石柱表坊一座，石栏围护（今已废）。“每年三月三日由长官率士绅备牲醴庶馐致祭。”这天龙鹄山是游人如织，热闹非常，城里的人倾室而出，如赶庙会，聊表“长编细读心弥仰，幸得春祠拜哲人”的敬仰之情。

附：谒三相祠诗

龙鹄御书恐未真 为寻碑碣踏芳辰

乾坤正气留松柏 俎豆馨香荐藻萍

碧水丹山俱过化 光风霁月自传神

长编细读心弥仰 幸得春祠拜哲人

《松柏铭碑》，是我县珍贵的文物瑰宝，亦是全国稀有之珍品，在全国屈指可数的几通唐碑中它是保存最完整，而又是纯唐隶书，因此，它的历史价值、艺术价值和科研价值也就最高。位于龙鹄山腰，海拔八百一十五米，原中观寺庙之右上方，摩岩造像石窟群之间，深约一公尺之崖壁上。该处原广植松树柏树万余株，有松柏坡之称，古树森森，气象万千，松柏碑因此得名。松柏铭碑石刻仿碑制度，碑高二米二，宽一米五四，碑字隶书，笔力道劲，每字约四厘米，共五百八十九字，碑末纪年：“天宝九载岁次庚寅四月十二日建”。按天宝系唐玄宗年号即公元750年，距今已经历一千二百多年的风霜岁月，而摩岩碑文保存如此完好，虽内容主要是记叙女道士成无为（丹棱人）一生事迹的传记文，但确是研究当时书法艺术，考证地方史志以及研究今古石刻艺

术的保护，具有极高的科学艺术价值。

二、龙鹄山道教摩岩造像：道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流传的宗教。有二千多年的历史。道教与流行世界的三大宗教（基督教、佛教、伊斯兰教）不同，它产生于我国本土，源于中国古代对神仙的信仰和巫觋方术，吸取道家 and 墨家的某些思想因素，参用儒家的伦理纲常和佛教的因果报应，并揉进阴阳五行说和汉代谶纬之学，成为一种思想庞杂，具有东方特色的汉民族宗教。它始于西汉，盛行于东汉，到了唐代，由于政治、经济等多方原因，道教几度受到特别的尊崇，唐高祖、唐太宗巧妙地利用了与道教主李耳同姓的关系，确立了道教“皇帝”的地位。唐武宗时期（会昌），朝廷禁佛尊道，以老子的生日为“降神圣节”进行庆贺。由于统治集团的带头提倡和崇拜，因而唐代的道教是很盛行的。龙鹄山道教摩岩造像就是在这种政治条件的影响下于唐开元年间（713—741年）为我县女道士成无为所营造，共计五十三龛，最大的为一米六三，最小十九厘米，一般四十四厘米左右，约七百余尊，内容题材有“汉武帝望仙祈年”等故事，其间不少造像受佛教影响较大，表现是仿佛教佛像制度。此外尚有仙人顶上的宋代元祐年间杨素营造的道教造像七龛，旁有：元祐庚午杨素掣男时晖夏课此山”题记。元祐是宋哲宗赵煦年号，庚午是公元1090年，迄今将近九百年。杨素是我县宋代大史学家李焘的岳祖父，也是“大雅堂”的营造者。

御印碑遗址在石窟寺侧，是宋孝宗赐敷文阁大学士李焘的“龙鹄山”大字石碑基座。原碑高约六公尺，宽一公尺三，厚约四十厘米。碑毁于“文革”动乱时期。据县志记叙宋孝宗书“龙鹄山”三字

刻碑丈余，有玺曰“皇帝宸翰，以赐敷文阁学士李焘者也。”故人称：御印碑。相传：宋孝宗一天早上起床梳洗，看见金盆中现出一座奇秀的山峰，马上召见群臣入宫观看，并遍问臣下此山何名，在哪州哪县？众文武皆不相识。唯有大学士李焘跪奏：金盆中所现奇峰乃臣故乡丹棱城北的龙鹤山。孝宗大喜特书“龙鹤山”三字赐于李焘。后来孝宗多次在金盆看到此山，便有意把京城从临安迁到丹棱。遭到群臣谏阻，说是有山无水非帝都所宜。后来此事作罢。金盆中的山景也不再现了。（原载《丹棱文艺》吴家瑞“八景今昔”）原碑毁于“文革”中。现存的巨石碑基，可窥见当时石碑的壮观，也可想见当时孝宗信赖李焘的深情。

“上有天柱峰，下有龙涎洞”。洞位于石窟造像下石半坡，坡上有三百余级石梯。坡下为烟波浩渺的中观山湖，居高临下，雄伟壮丽，景色宜人，蔚为奇观。据县志《方外》记：“唐开元成无为女道士，幼年出家，誓不字人，卜居龙鹤山下，调形炼气，却粒茹芝，栖隐处有龙洞遗迹”。龙洞即为龙涎洞，亦名老君洞，又称“三仙洞”。三仙指成无为，李炼师；眉山人，天宝中修道于松柏坡，遇旱祷雨其应如响，杨正见“修炼于龙鹤观中，遗迹尚存。”相传三人在此修真养性成道。明宏治中学使王勅书“龙涎洞”于上。旁有明举人陈琨手书“委雪屯烟”石刻并志以诗云：

望入岩烟古径斜 遗踪旧是炼师家

缘磐碧草垂书带 峙顶丹枫长性花

楼阁半依苍树暝 碑镌尽是乱云遮

何当百世年湮远 重鼎嵯峨焕九华

雁湖：龙鹤山下三公里处，系宋代名臣礼部尚书，资政殿大

学士李壁开凿的一个小湖。据县志《古迹》记：“雁湖在县城北十二里，俗名：‘金鸭塘’，宋李壁凿广数亩，花木极盛，中多梅，清令毛震寿书“雁湖渔火”四大字刻碑并志以诗。

宋·史少弼咏《雁湖》

梅艳凌霜带雪余 露华洗尽玉生肤
东方千骑催人去 聊折春风寄雁湖

宋·魏了翁《雁湖梅》

阴阳互推移 气数有信屈 涧松发直枝
墅梅啐生色 虽无桃李容 依依保终吉

清·毛震寿《雁湖渔火》

云开雁路雨初停 篝火参差渡远行
两岸芦花渔父笛 声声催落半湖星

宋·李焘《雁湖梅》诗

魏面千顷阔 修眉一带横 湖深有龙蛰
山静少人行 似与长仙约 都忘世俗情
鸟啼猿叫歇 轩乐有余清

“此诗首先描绘出一个开阔千顷的湖面，波平似镜，如修眉之秀的雁湖象一条练带，横飘东西，使人感到清新，舒展。在此，诗人有感于景，触景生情。他仿佛与遥远的神仙在约会，从面忘却了一切世俗之情，甚至连自然界美好的‘鸟啼’，‘猿叫’也歇息了，万物俱寂，剩下的只是诗人独吟清唱的‘轩乐’还在雁湖畔上荡漾。结尾两句尤佳，一静一动，息中有音，景情相生，以景结情”。（见《巴蜀文苑英华》）

从历代诗人的吟咏中，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的雁湖的确是风景如画，
窈窕多姿的：山光，水色，芦花，梅花，渔火，雁声，笛声，鸟啼，
猿叫。在这风光秀丽的景色中，难道不使人怡然陶醉吗？只惜年久失
修，昔日的名胜，早已物换星移了。今后若能维修，当然不失为景优
美的名胜风景区。